

# 春風化雨四十載

## 黃顯宗先生訪談紀錄

### 黃顯宗

1952 年生，香港大嶼山人。自幼在香港長大，大學時以僑生身份就讀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於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並在美國喬治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1982 年進入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任教，致力於教學與學術研究，曾多次獲得國科會計畫補助出國進修與個人研究計畫。黃教授所開設的課程特別著重科學與社會人文層面的跨領域結合，亦強調社會責任。黃教授也長期關注外雙溪的生態環境，透過通識課程讓學生認識並參與相關的保育活動。黃教授退休後仍持續在學校開課，持續關注相關的研究領域與環境保育問題。



訪 問 日 期： 2023 年 10 月 17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  
2024 年 09 月 02 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訪 問 地 點： 東吳大學第二教研大樓 D0615  
使 用 語 言： 國語  
訪 談 人： 李玥軒、徐雅茵、陳苡銜、曾獻緯、廖峻逸、  
鄭羽澤  
紀 錄 人： 李欣容、李雨軒、林心筠、曹涵琇、莊奕揚、  
陳苡銜、曾時君、鄭羽澤、鄭祐翔



上圖：黃顯宗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戶外導覽。陳有瑾 攝

## 香港的童年到中學（1952-1971）

我是東吳大學退休教師黃顯宗，1952年在香港的九龍廣華醫院出生。<sup>1</sup>我的祖先從中原移民到福州，後來到了香港，住在大嶼山，<sup>2</sup>是香港最大的島。我們家以種水稻維生，在鄉下擁有田產，但子孫們不太長進，田地就慢慢減少了。我自己是簽署遺囑要放棄擁有權，都讓給我弟弟的小孩。我父親是海員。不同於船長或水手，海員是在輪機底下管理機房。他一開始是在近海港口的渡輪上工作，後來才去跑遠洋船隻，因此他長年不在家。父親跟著船去過很多地方，日本、臺灣……等。我在臺灣唸大學時，還在高雄港見過他一面。

我住在大嶼山的鄉下地區，小時候看到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搬到香港，他們大部分是因為窮困離開原鄉，也大多反對中共、擁護國民政府，因此每逢雙十節，滿街到處都是國旗。我小學就讀大嶼山的梅窩學校，<sup>3</sup>規模很小，一個年級只有一個班級。我一年級時是第九名，之後逐漸進步，到了高年級已經是第一名。

小學畢業後，我沒考上公立的初中，只好讀位於長洲島的私立五邑中學。<sup>4</sup>因為這裡離家裡比



右圖：黃顯宗老師小學畢業照片。黃顯宗老師提供。

- 1 廣華醫院：1911年東華醫院總理及九龍的華人領袖於九龍地區興辦，作為東華醫院的九龍分院。1931年，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和東華東院三間醫院合併為「東華三院」。（古物古蹟辦事處：香港法定古蹟—九龍，2024年9月24日下載，[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monuments/kowloon/monuments\\_95/index.html](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monuments/kowloon/monuments_95/index.html)）
- 2 大嶼山：位於香港西南方，是香港島最大島嶼，為當時中國人民逃離中共政權的重要登陸點。（〈以逃港難民 開發大嶼山 港方已予考慮〉，《聯合報》，1962年7月2日，第1版；〈黑夜力泅二萬公尺 大陸游泳健將 陸達安獲自由 跳海逃亡冒死逃抵香港〉，《聯合報》，1962年8月13日，第1版）
- 3 梅窩學校（Mui Wo School）：1939年創立於涌口葵寮，設立初期校地狹小，教育官尹耀聲聯同當地人士在香港大嶼山銀礦灣大地塘村興建學校，並逐漸擴展校舍。（梅窩學校：學校歷史，2024年8月4日下載，<https://www.mws.edu.hk/tc/content.php?wid=556>）
- 4 五邑中學：1963年於長洲島花屏路創立五邑英文書院，是長洲最早提供全英文課程的中學，至今已經停辦。（香港古事記：長洲賓客…歷史悠長（一），2024年9月24日下載，<https://medium.com/%E9%A6%99%E6%B8%AF%E5%8F%A4%E4%BA%8B%E8%A8%98/%E9%A6%99%E6%B8%AF%E4%B8%80%E6%97%A5%E9%81%8A-6-%E9%95%B7%E6%B4%B2%E8%B3%93%E5%AE%A2-%E6%AD%B7%E5%8F%B2%E6%82%A0%E9%95%B7-%E4%B8%80-%E5%8C%97%E7%A4%BE-%E6%9D%B1%E7%81%A3-%E8%A7%80%E9%9F%B3%E7%81%A3-dbea684c0a0c>）

較近，也比較便宜。<sup>5</sup> 長洲島是一個漁村。我每天都要坐船半小時去上學。五邑中學主要是臺灣畢業的僑生回去辦的學校，除了國文跟中國歷史是中文的之外，其他都是全英文教學。從初一開始，就有師大國文系的畢業生來教我們ㄅㄆㄇㄏ，另外還有外國女老師來教聖經。我從全中文的小學進入到一個幾乎全英文的初中，一開始當然非常不適應。當初在鄉下的小學我都是第一名，自以為很了不起，但一到城裡才發現自己什麼都不是。鄉下的學生程度是有差的，非得要每一級都要進步，要比別人更努力才能跟得上。

高中到香港本島城裡就讀私立西南中學。<sup>6</sup> 那時候住在叔公家裡，他是國軍，曾參加過北伐、抗戰與剿匪，剿匪失敗以後就來到香港，他很親近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他還會教我們唱黃埔軍校的校歌。我一開始讀的西南中學當時並不太好，是那種報名就可以進去念的學校，沒有幾個人能夠考上大學。我在西南讀了兩年。Form 5（英文中學的中五）時有一個畢業會考，我的生物成績是最好的 A 級，物理 B 級、數理 C 等等。最差的是中文跟英文只有 E 及格。我喜好文藝，我還以為我中文很行，考了以後才發現不是那麼回事。

香港一般人都讀完中學就不讀了，有些甚至念完小學就不念書了。我那時候念得還不錯，就想要往上再讀，而且家裡只有我一個人讀書，勉強還可以支應。本來要考工專，但沒被錄取，就轉讀私立威靈頓書院。<sup>7</sup> 書院是香港的中學，英文都叫 College。威靈頓書院有四、五個分校，是一所規模更大的英文中學，也是全英文教學，沒有中文的教科書。張國榮就是那個學校畢業的。現在也倒閉了。那時候公立中學的比例提高之後，私立的就很難生存下去。

---

5 長洲島：位於珠江口以東，香港島西南約 16 公里，面積約 3 平方公里，珠江口外重要的漁業中心，島上與漁業相關的商業活動十分興盛，如船廠、山貨、雜貨店林立。二戰後，港英殖民政府曾鼓勵本港的漁農業發展，並帶動輕工業的發展，如紡織、皮革、塑膠、食品加工等。（馬木池，《殖民管治下的傳統節慶：長洲太平 清醮的流變》（香港：康樂文化事務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2022），頁 5）

6 西南中學：1928 年張瀾洲於灣仔交加里創立，是香港最早中文學校之一，提倡新學制、新科學、新管理，分設男女校。（香港記憶：戰前香港教育，2024 年 9 月 9 日下載，[https://www.hkmemory.hk/collections/education/All\\_Items/PreWarEdu\\_Prints/201303/t20130311\\_57187\\_cht.html](https://www.hkmemory.hk/collections/education/All_Items/PreWarEdu_Prints/201303/t20130311_57187_cht.html)）

7 威靈頓書院（Wellington College）：1947 年張沛松在香港威靈頓街創立，為私立中學，1970 年代該校發展最高峰期，分校多達 5 間，至 2001 年該校結束營運。（香港ウエルントン中学威靈頓英文中學（Wellington College），2024 年 9 月 9 日下載，<https://ameblo.jp/lcing/entry-11028573210.html>）

初中以前我喜歡美術與繪畫，到了高中開始喜歡歷史與藝文，我的歷史成績也很不錯。高二的時候，我參加了會考，我的物理、數學都很好，最好的是生物科，可能因為是背誦比較好吧。從那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有生物學的天分，後來還以當生物學家為志向。威靈頓書院我讀了一年 Form 6，就要考大學。香港的學制比較偏向英國，和臺灣的學制很不一樣，都是念完中 7 才去考大學，港大就念三年，中大要念四年。那時候香港大概有五百萬人口，但是只有兩間大學，中文大學跟香港大學。連現今香港理工大學那時都是工專、專科而已。有好些都是知名的中學，排在我們的前面，像是皇仁書院 Queen's College。<sup>8</sup> 後來我回去念香港中文大學碩士班的時候，很多同學都是從這些知名的書院出來的。

我評估了當時自己的程度，要報考香港的兩所大學並不容易。所以當時連考都沒有去考，到書店買了中文的教科書，自己讀了兩個月就去考臺灣的大學入學考試。當時是在香港考入學考試，與香港人競爭。在志願選填時，我填了臺灣大學、<sup>9</sup> 國防醫學院的醫學系，<sup>10</sup> 另外還填了五個動物學系與植物學系。後來沒考上臺大跟國防的醫學系，錄取了最後一個志願序，中興大學植物學系，<sup>11</sup> 我是以僑生身份進入中興大學的，<sup>12</sup>

---

8 皇仁書院 (Queen's College)：1862 年在中環歌賦街開辦，香港第一間官立學校，原名為中央書院，1889 年改名為維多利亞書院，再於 1894 年正名皇仁書院，二戰期間遭受損害，1950 年遷校到銅鑼灣高士威道。(革命地圖：第二代中央書院，2024 年 9 月 9 日下載，[http://www.hkmemory.org/city\\_relics/text/index.php?p=home&catId=116&photoNo=0](http://www.hkmemory.org/city_relics/text/index.php?p=home&catId=116&photoNo=0))

9 臺灣大學：前身為 1928 年創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是臺灣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1945 年接受後改名為「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位於古亭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臺灣大學醫學院的前身為 1899 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醫學校」，1922 年改稱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1936 年與「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合併稱為「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1945 年後改制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目前位於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1 號。(王月鏡主編，《臺北市志卷七：教育志學校篇》(臺北市：臺北市府，1991)，頁 327-330)

10 國防醫學院：前身為 1902 年於天津創立的「北洋軍醫學堂」，1949 年隨政府遷至今汀洲路一代的舊日軍營舍，並更名為國防醫學院。1968 年由退輔會主委蔣經國指示，國防醫學院聯合軍醫系統成立臺北榮民總醫院及國立陽明醫學院，1983 年三軍總醫院規定於國防醫學院，成為其直屬教學醫院。1999 年自公館水源校地遷至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 161 號。(國防醫學院：校史，2024 年 8 月 8 日下載，<https://www.ndmc.ndmctsgh.edu.tw/unit/100001/911>；陳金讚主編，《內湖區志卷六：文教篇》，2024 年 8 月 8 日下載，[https://nhd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4624B66DAE97712&sms=182753B4C8854F02&s=31B97FACF771E27C](https://nhd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14624B66DAE97712&sms=182753B4C8854F02&s=31B97FACF771E27C))

11 中興大學植病系：全名為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1946 年臺灣省立農學院成立後，院內有農藝學系、森林學系、農業化學系，植物病理學列在農藝學系課程中。由於農作物病蟲害對於農業的重要性，隔年奉教育廳核准成立植物病蟲害學系。1954 年將植物病蟲害學系分為病理組與昆蟲組，1960 年昆蟲組改為昆蟲學系，而病理組改為植物病理學系。(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系所沿革，2024 年 8 月 8 日下載，[https://www.pp.nchu.edu.tw/?page\\_id=52](https://www.pp.nchu.edu.tw/?page_id=52))

12 中興大學：位於臺中市南區興大路 145 號，前身為 1919 年設立的「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後因學校擴張與組織變更，陸續更名為「臺灣總督府高級農林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農林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民部」、「臺灣總督府臺中高等農林學校」、「臺灣總督府臺中農林專門學校」。二次大戰結束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改為「臺灣省立臺中農業專科學校」，隔年成立於改制為「臺灣省立農學院」，並於 1961 年 7 月併入成立臺灣省立中興大學。(陳瑞堂主編，《臺中市志卷五：文教志教育篇》(臺中市：臺中市府，1976)，頁 551-552)

那是額外的名額，並不影響臺灣學生的名額。那時候中興的港澳學生的學生會大概有五十幾個人，每年大概有十幾個新生。

## 大學：中興大學植物系（1971-1975）

我對臺灣第一個印象是：臺灣的火車真棒！我第一次來到臺灣是搭飛機，從臺北松山機場下飛機後，搭計程車到臺北車站，再搭火車前往臺中。我搭乘的是莒光號列車，一進車廂看到很高級的沙發椅子，還有服務人員送茶，當時我覺得臺灣的交通真棒，不過後來搭平快車或一般公車就沒那麼好了。

我那時候要來臺灣讀書，家裡的態度也是勉強支應，因為家裡還是只有我一個人再讀書。其實我要繳的費用不多，也不需要多少錢。那時候的消費很便宜，而且我都能領取獎學金，起碼夠付每學期 2,500 元的學雜費。獎學金最多的一次是 10,000 元，我就可以撐四個學期。不過那筆獎學金背後有個遺憾的故事，我大一時，曾看過一位很高挑又很漂亮的大四學姐，她是醫生的小孩，成績也很好，但後來因為抑鬱而走上了死路。學姐過世後，她父親捐贈獎學金給學校，雖然我拿到這個獎學金很高興，但對於學姐離世還是感到很遺憾。

我從大一開始就成績很好，一堆女生都圍在旁邊要看我的筆記。因為從初一到威靈頓書院就讀後，已經在全英文學習環境裡讀了六年，原文書對我來說完全沒問題。我的英文底子相對好些，讓我佔了兩年的優勢，其他臺灣同學兩年之後就跟得上了，出國讀書以後就沒什麼差別了。那時候同學都是建中、中山女中，不然就是北一女，不然就是雄女、南女，還有臺中女中，都是好的中學。當年念中興的都是好的中學畢業的。

在大學期間，我跟同學們的關係都很不錯，對男生女生都很好。去過好幾個男女同學的家。我曾到過士林小北街的同班同學家，還到過一個高雄的女同學家裡，也去水上和屏東市的同學家拜訪過。我很喜歡跟臺灣同學待在一起，反而很少跟香港僑生一起行動。剛來到臺灣時，語言是一大問題，幸好我從初中就學了ㄅㄆㄇ。因為臺灣和香港有些名詞的說法不同，雖然沒有很嚴重的口音，但還是被同學嘲笑，像臺灣叫

衛生紙，香港叫廁紙，剛開始發現同學們聽不懂會有一點尷尬，後來彼此適應了之後就沒什麼問題了。

臺灣跟香港的生活型態完全不一樣，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以前在香港讀書的時候，都住在家裡或叔公家，家人會幫你煮飯。但在讀中興時，大部分都在學生餐廳吃飯。食物方面，剛來臺灣的時候經濟比較拮据，我比較在意能不能填飽肚子，但偶爾還是會懷念一些香港的料理，比如說煲仔飯、燒肉、叉燒等等。衣服也要自己洗，我還學會了新的洗臉方式。1972年時，我到士林小北街的同學家拜訪，靠近臺北市警察局士林分局。他們家的洗臉方式是除了用肥皂清洗之後還會用清水潑臉，而不是使用濕毛巾，潑完水之後才會用毛巾擦乾，看到他們洗臉的方式，我也跟著學習，因為我發現濕毛巾如果沒有晾乾，會很容易發臭。大一和大二年都住學校宿舍，第三年宿舍不夠了，我就和同學到校外的國光路附近合住雅房，兩個人住上下舖，浴室在外面。



左圖：黃顯宗老師於金門服兵役。黃顯宗老師提供。攝於1975年

大三時，我開始覺得植物系的未來出路很窄，偏見啊。念植物系，很多都是在搞植物分類，分類我也滿喜歡的，可以出去爬山、做乾燥標本，都很有趣。但我要去分類什麼門、綱、目、屬、種，我覺得這是屬於前一代人，像是王雲五那個年代、博物學的事。還要背誦這些學名，我就更沒有興趣了。畢業後，有些同學都去念植物的碩士、博士，也都有很好的成就。我那時候只是很簡單的想，微生物肉眼看不到，感覺比較吸引人。但如果要選微生物的課，植物系裡面只有開藻類學（algology），其他微生物的課程，都在植物系以外的系開，非得到別的系去修。例如，細菌學、真菌學是植病系，原生種是昆蟲系。所以我大三時到植病系去上徐世典老師的細菌學。<sup>13</sup> 大四那年也幾乎都在植病系上課，進入他的實驗室之後，才比較熟悉。徐老師是客家人，人很好，很認真。他是康乃爾（Cornell）的植病博士，那時候他很年輕，回來臺灣不久、剛升教授。

在 1970 年代，很多人都會到美國念研究所。但我大四時，家裡沒辦法負擔我出國的花費，因此我無法在畢業後馬上出國念書。所以我考研究所時，選擇了臺灣大學植物系、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sup>14</sup> 和中興大學植物系。我還記得當時中文大學的入學考是在輔仁大學舉行，<sup>15</sup> 都是英文的考題，我也都用英文作答。應試完臺大跟中文大學後，我有自信能夠上榜，交完報名費後就沒有到中興大學考試了。因為同班都要報考中興植病系，那是一個保底的地方，我不想佔其他同學的名額。

最後臺灣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兩間學校我都有考上，在選擇志願序的時候，經濟是我考量的重點。臺灣大學每個月會有教育部補助的碩士津貼，一個人大概是每月 2,000 元左右。而香港中文大學的津貼是港幣 1,400 元，那時候的匯率大概是乘以七、乘以八，換算下來差不多是臺幣 7,000 至 8,000 元，與當時臺灣講師一個月的薪水不相上下。因為希望能夠存點錢，未來去美國念書，最後我決定回香港中文大學讀碩士班。當時我的女朋友住在臺北，也因為回香港讀書，所以最後和她分手了。

---

13 徐世典：屏東麟洛人，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專業領域包括植物病原細菌學、植物細菌性病害、植物病理學。1797 年至 1985 年擔任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系主任，2000 年至 2003 年擔任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院長。（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退休教師介紹，2024 年 9 月 9 日下載，[https://www.pp.nchu.edu.tw/?page\\_id=304](https://www.pp.nchu.edu.tw/?page_id=304)）

14 香港中文大學：1963 年在九龍郊區的沙田成立，係由香港的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與聯合書院合併而成，與香港大學為姊妹校關係。香港中文大學以國語作為主要授課語言，而香港大學則以英語授課為主。（〈香港中文大學 定今秋成立 港府撥 2 百餘款建校 建築費達 8 千萬港元〉，《聯合報》，1963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香港中文大學 十月中旬成立〉，《聯合報》，1963 年 9 月 27 日，第 2 版）

15 輔仁大學：1925 年由本篤會在北平舊濤貝勒府成立，隔年更名為輔仁大學，1959 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捐助在臺復校，1961 年教育部正式核准在臺北市吉林路成立，1963 年正式將校址訂於新莊。（張勝彥，《續修臺北縣志卷八：文教志》（臺北縣：臺北縣政府，2002），頁 223）

## 碩士：香港中文大學（1975-1977）

到了香港中文大學，其實也沒有太多選擇，因為我是從別的學校考進碩士班的，大部分老師的指導名額都給了原本中文大學的學生，像系上有位印度女農生，找了當時的英國人系主任做指導教授。學校安排我到一位做真菌學的老師鮑運生門下，<sup>16</sup>鮑老師是來自南京的流亡學生，畢業於臺大農經系，曾在中央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當過研究員，之後才到香港去。他到香港的時候，是進入新亞書院，這是錢穆、徐復觀、唐君毅他們辦的。<sup>17</sup>之後新亞、聯合、<sup>18</sup>崇基，<sup>19</sup>三個書院才合在一起，變成中文大學。三個學院的來源不一樣，聯合是另外一批人辦的，崇基是教會學校。



右圖：黃顯宗老師於香港中文大學就讀碩士班。  
黃顯宗老師提供。攝於1977年。

- 
- 16 鮑運生：1953年於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畢業，曾任職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1959年赴美深造，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獲得植物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其研究範疇為真菌。1963年鮑博士赴港加入新亞書院，任生物系講師，後歷任香港中文大學生物系講師及高級講師，至1984年離任。2022年於多倫多逝世，享年90歲。（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訃告一則，2024年9月9日下載，[https://www.na.cuhk.edu.hk/e\\_newsletter/obituary-chinese-only/?lang=zh-](https://www.na.cuhk.edu.hk/e_newsletter/obituary-chinese-only/?lang=zh-)）
- 17 新亞書院：錢穆於1949年在香港創立，當時中國處於戰亂，大批學者流亡至香港。為了延續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精神，錢穆與唐君毅、張丕介等學者共同設立書院。創立初期，學生僅有數十人，書院以推廣中國文化和儒學教育為核心使命。1954年，書院獲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學術發展與教學設施得以大幅改善。1956年，書院遷至九龍塘新校址，鞏固其在香港的學術地位。1963年，新亞書院與崇基學院、聯合書院合併，成為香港中文大學的三個成員書院之一，從此成為中大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概覽2023-2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2024），頁11-23；陳學然，〈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臺大歷史學報》（臺北）70（2022年12月），頁167-244）
- 18 聯合書院：1956年合併五所私立學院一大中學院、光夏學院、文商學院、華南學院、和公道學院，成立香港聯合書院，提供更完善的高等教育。1963年，香港聯合書院與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共同組成香港中文大學，成為中大的三所創校書院之一。（陳學然，〈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臺大歷史學報》，頁167-244）
- 19 崇基書院：1951年基督教教會和教育界人士共同創辦，目的是為了提供高等教育，並以基督教精神為核心培養學生。崇基書院最初位於旺角，早期的學生和資源較為有限，但在創校教職員的努力下，逐步發展。1954年，香港總督葛量洪批撥沙田馬料水作為興建崇基書院校舍，學術和生活設施逐漸完善。（陳學然，〈文化冷戰——香港中文大學的成立〉，《臺大歷史學報》，頁167-244）

鮑運生老師的太太是香港人，所以他會講廣東話和國語。我在研究室都用國語和他討論。對我來說，在碩士班讀書其實也沒有太大的變化，我也同樣認真的學習、做實驗。雖然是學校安排我去鮑老師的實驗室，但卻讓我對真菌學有更多的了解。其實我從大學的時候就很討厭真菌學，覺得真菌都是些烏漆墨黑的、發霉的東西，而且教科書裡有一大堆真菌的分類，但我也不太喜歡分類學。但後來我才發現紅麴菌很奇妙、很美麗、很 elegant，是一種非常優雅的生物，以前的認知是錯誤的。

鮑老師那時候還沒有什麼很明確的計畫，他喜歡做紅麴菌，實驗室裡面有一堆紅麴菌的培養，但他只有兩個學校派給他的助理，只來工作半天，幫他做點小事情。那時候鮑老師研究室也沒幾個人，就只有我一個研究生而已。我到了中文大學以後，鮑老師才有了比較明確的計畫。那時候紅麴菌生產的是紅麴色素，可以作為食品的天然色素。我們希望能透過突變得到不同的色素，生產出能力不一樣的菌株。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裡就有記載，紅麴可以使肉經久不腐。後來我們發現，紅麴菌中有一種抗生素可以拮抗細菌，這就成了我第一篇，也是首篇發表在國外期刊的論文。那時候我真的很高興，老師帶著這些數據，還有我做的海報，去參加世界真菌學大會。我離開以後，有另外一個中興植物系畢業的學弟進來，之後也陸續有些中興的植物系和植病系的學弟進入中文大學讀研究所，或是當助教。

我在香港讀碩士的時候滿認真的，也很主動。會去圖書館找別人研究過什麼東西，還有什麼東西別人是沒有研究過的。在香港大學的就學期間，我發表過三篇期刊論文。紅麴之所以值錢，是因為日本發現它可以降膽固醇，但抗生素就比較不值錢。那時候沒想到，如果要賺錢的話，應該要走日本人現在的路。當時只想當科學家，不要走賺錢的路，也不要跟在別人屁股後面。

香港和臺灣的研究環境有一些差別。研究室裡空調、書桌、實驗桌當然都有，很現代化、很舒服的。然而，香港的計畫來自香港政府，臺灣的計畫來自國科會，申請計畫的管道有一點點差別。另外，香港沒什麼競爭，只有兩個大學。但香港的研究與國際的交流比較多，老師們常到國外去開會，每年都會去國外度假。臺灣的老師到國外開會的，一年連可能一、兩個都沒有，但香港是每年都有好幾個。

那時候中文大學沒有博士班，都得要到國外進修，繼續研究這個領域。鮑老師介紹我去他一個同學那邊，但因為我不喜歡那個氛圍，所以只待了半年。那個學校位在市中心，老師的研究不專心。老師自稱有錢又有名（rich and famous）。有錢的原因是他在外面開了一間比較少見的臺灣餐館，都很晚才來上班。另外，美國大學的計畫獲得率大概是兩成，臺灣約是四、五成，有名的原因是他拿到了研究計畫。我喜歡專心在學校裡工作的老師，不喜歡在外面搞副業的人。

我這時才想到，曾經認識了一個很關注東方發酵食品的美國農業部專家，<sup>20</sup> C. W. Hesseltine。二戰時，有些美軍流落在太平洋的島嶼上，他們被尋回之後，發現他們身體都還不錯。原因是他們都吃了當地的發酵食品。所以，那段時間美國人正在研究東方的發酵食品。我對 Hesseltine 表示，我正在做紅麴的研究，你能不能幫我介紹一些讓我可以繼續研究的地方？他介紹了三個地方，一個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另外一個是私立的康奈爾大學，徐世典老師的母校。第三個是喬治亞大學。透過 Hesseltine 的介紹，我在春天時跟這三個地方聯絡上了，也表示對於獎學金的需求。前面兩個學校都表示相當歡迎，但得等到秋天才有獎學金。然而，喬治亞能夠在春天就給我獎學金。經濟方面仍是我考慮的一大重點，所以我就到喬治亞去。喬治亞是全美國前五十大學，雖然不是我最想要去的學校，但因為每個月有美金 600 多元的獎學金，這足夠讓我在讀博士之際，也能負擔交通和飲食費用等。

先前我在香港考過 GRE 跟托福，<sup>21</sup> 那時寫信去喬治亞大學申請、繳交各種資料，以及最重要的推薦信。我順利通過申請後，事先問了喬治亞大學能不能讓我繼續研究紅麴菌？他們願意接受後，我才到喬治亞大學深造。

---

20 美國農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是美國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負責執行與農業、林業、農村經濟發展和糧食相關的行政事務。旨在滿足農民和牧場主人的需求，促進農業貿易和生產，確保食品安全，保護自然資源，培育農村社區，並致力於消除美國和國際上的飢餓。該部藉由對農業生產的支持，提高美國人民的生活品質。（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2024 年 9 月 24 日下載，<https://www.usda.gov/>）

21 GRE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研究生入學考試，做為美國、加拿大等國家錄取研究生的標準之一，考試內容強調寫作分析、字彙；托福 (TOEFL)，為一種國際英語檢定，強調應試者的基本溝通能力。（〈死背「機經」未必能拿高分 GRE 題目變靈活 作答先找關鍵字〉，《聯合報》，2011 年 8 月 7 日，第 A3 版）

## 博士：喬治亞大學（1979-1982）

剛到喬治亞大學時，原本的指導教授人在很遙遠的研究站，他就推薦了一個在主校區一位研究食品色素的德國裔教授，Köehler。他那時候手上有計畫，也有經費。喬治亞大學有設立農業站，有喬治亞州撥給農業的研究經費，教授們就用這個錢請助理。我領了一年系內助教（TA）跟研究助理（RA）的錢，我很主動去找事情來做，老師也很高興。第二年我的成績不錯，申請到學校經常性的獎學金，就不用領系上的錢。教授也很高興我可以拿學校的獎學金，他就不用辛苦負責幫我找錢。

我在喬治亞待了三年多就畢業了，畢業論文還是寫紅麴。我把之前發表的三篇論文拼在一起，把原本不溶於水的紅麴色素，透過突變，產生水溶性的色素。另外就是紅麴的生理培養，如何能夠增加紅麴產生的色素。我六月畢業之後就離開，但我的獎學金可以領到七月底。後來我跟負責管農學院經費的院長討論，他直接把六、七月的錢通通給我，每月領的獎學金居然可以先發，臺灣才沒有這種好事。

我到臺灣、香港和美國讀書後，發現三者差異最大的是授課教材。在臺灣唸書，但因為正版教科書價格較高，我們會使用歐亞版、美亞版的教科書，就是影印版。在香港則使用印度版教科書，但印度版的紙質又差又厚。到了美國，就用美國版，但在美國原版的教科書並不便宜，我只能到大學書店去買二手的。美國的大學書店叫 University Book Store，裡面有個地方在賣比較便宜的二手課本，上面還會有上一任或上上一任主人的劃記與重點，我覺得還不錯。

這三個地方的學習方式也很不同。在臺灣以基礎學科為主。香港的大學比較偏歐洲形式，不用上什麼課，都是討論，或是跟著老師做實驗。美國就跟臺灣比較接近，也要上理論課和實驗課，但我念的是念博士班，課也不多。唯一讓我為難的是，學校要我去讀生化和第二外語。讀生化的痛苦之處在於同一本課本已經讀過好多次了，在臺灣就讀過兩次，到美國又要再讀一次，煩死了。那時候都是國外客座的、博士後的學者來幫我們上課，一般來講都不難，只是都是同樣的東西，很煩。第二外語也是很煩，當年臺灣理學院的科系都以德文為第二外語，這和當時的論文發表有關。農學院的話則是學日文。我在中興學了兩年德文，到了美國又學了一年，但現在幾乎都不記得了，

ABCD 都唸不全。第二外語就是用得到才有用，用不到也很容易忘記。但後來幾乎論文都以英文發表了，漸漸就不再需要第二外語了。那時候我研究紅麴，反而是日文變得比較好。因為紅麴的相關研究有很多都是日本人做的，他們很看重自己的尊嚴，所以早年研究都是用日文寫的，登在日本國內的雜誌上。



左圖：黃顯宗老師於美國喬治亞大學就讀博士班。  
黃顯宗老師提供。攝於1980年。

在實驗室的管理方面，我覺得三個地方的差異不大。我在臺灣這邊唸書的時候，實驗室是用木頭的桌子，因為當時做的是植物的病菌，對人不會有傷害，所以管得很鬆散。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時，系上沒有人研究病菌，所以也沒什麼在管理。後來到美國做食品細菌，我當時研究的食物中毒細菌

是二級的食品菌，有治療、預防，都沒什麼問題。後來美國有人在做病菌，食物中毒、變異病菌，也沒特別看到有人管理。回到臺灣工作後，也都沒有嚴格的控管，當時我做病理研究，養一大批小白鼠來做實驗都不成問題。不過國家在十幾年前開始控管，大概是2000年美國911事件後，因為有人使用微生物病菌作為武器，才開始嚴格控管實驗室。其實本來就該嚴格管理，只是大家很鬆散不太在意。

我並不喜歡植物，當年偏見也覺得純讀植物學比較沒有出路，後來沒有再進一步學習，到現在我也沒辦法認得太多植物，要依賴 Google 幫我判定。選擇科系時，因為成績不錯，我就有選擇的空間。但微生物是我認為領域更為專精，比較少人在研究的。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碩士時研究的紅麴菌，其實也在食品科學的範疇中，我一直都在做微生物與中毒細菌的研究。所以，在博士階段轉到食品科學系，對我來說沒有太大的差別，只是要學習食品科學系的相關科目，像是營養學等。食品科學系在美國滿好找工作的，和我同一屆的同學，只有兩個人回臺灣，一個到政府單位當官，我在私立大學教書，其他都是在美國找工作，所以我後來覺得當下沒有好好考慮，有些可惜。

## 回臺任教（1982-2023）

我會回臺灣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是因為我的女朋友。她本來是我的筆友。當初我在美國讀書時，大家都說，黃顯宗人很勤快，人也很好，為什麼沒有女朋友呢？但那時候我才剛跟第一任女朋友才分手沒多久，心裡還不太舒服。就有人問說，要不要幫你介紹？當時內人的同班同學在喬治亞念會計碩士班，就幫我介紹這個在臺北的女生，她後來成了我的媒人。我們每週通信，也互換了照片，我覺得她很漂亮，就這樣寫了兩年的信。通信時感覺她有文筆，也很居家，每封信都寫得很整齊。後來我就回臺灣跟她認識、結婚。第二個理由是報國。我的故鄉香港是被統治的殖民地，我不願意為殖民地服務。臺灣是中華民國唯一一個能夠民主化的地方，那是臺灣起飛的年代，每個人都很拚命，很認真，很有發展性，所以我覺得應該回臺灣做點事情。

當時決定進入大學教書，而沒有進入工廠，是因為我想要當科學家、老師和教授。那時候的想法很簡單，覺得在大學裡當教授做學問、做研究，感覺很清高，加上很自由，可以不管別人怎麼樣。就像北宋理學家張載的「橫渠四句」所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小時候在香港沒什麼娛樂，沒有電視看，只有聽收音機，聽太多這種忠孝節義的民間傳奇故事，像是瓦崗寨、隋唐演義，深受其害啊。

後來我回臺灣兼差做了一個要去調查工廠的教育研究計畫，我到臺南的統一工廠去訪問，<sup>22</sup> 當時工廠只有五十幾個員工，大學畢業的也沒有幾個人，廠長三十多歲，只有大學畢業，管一個工廠五十幾個人，產值每年五億。當時東吳大學的學雜費收入約十一億，七百個員工加上老師們才有十一億，完全比不上。但是我沒辦法在工廠工作，因為業界大家都是用閩南語溝通的，但我不會講閩南語。我太太是閩南人，父母親都講閩南話。第一次去工廠調查的時候還帶著我太太，訪問時就請她幫我翻譯。我後來和我太太學閩南話，現在會講一點點。別人罵我我聽得懂，但沒辦法流利到用閩南語去做訪問。

---

22 統一企業：為臺灣知名食品業，1967年由高清愿創立，為了不與老師吳修齊競爭，創立初期以引進麵粉等物資為主要業務，後來設立麵粉、飼料、沙拉油等工廠，並陸續開展食品相關業務，包含飲料、泡麵、牛奶，也延伸多角化經營，包含超商通路、金融事業等。（甘兆欽，〈策略與企業成長之研究——以統一企業為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雲林）30：4（2012年6月），頁64、67-69）

才剛創系兩年的東吳大學的微生物系是唯一錄取我的地方，那時候沒有人從國外回來，他們覺得我很好。而且東吳距離我太太在民生社區的娘家也非常近。那時候東吳的校長是端木愷，但是實際管事是副校長楊其銑。我進來以後拜訪過楊其銑，但沒拜訪過端木愷校長。我在國外時就跟楊其銑見過一次面，他當時是大使館的文化參事，到亞特蘭大來看僑生的表演，當致詞的貴賓，很瀟灑的一個人。

我進入微生物系後教的第一班是大三。那時候申開始請計畫，第二年就有計畫，但沒有研究實驗室，只能用學生實驗室。要等學生上完課後，我們再做研究。過了五、六年後才有研究實驗室。草創階段非常刻苦，我們自己建立研究室，拉資源，都是從零開始，全部都要自己積極辦理。例如，東吳最早的計畫管理辦法是我擬的，交給系主任、院長及學校通過後實施。我是第一批到學校研究組的辦公室裡，和他們一起黏存計畫發票的老師。從我當主任，到 2000 年之前的那幾年，各系老師的計畫都是各系自己管。這種管理方式是系上方便，學校方便，比較省人力，但是容易出問題。老師作弊，錢就容易隨便跑掉。現在計畫經費都匯到學校，有專人、有規範性管理。那時候我們系上每年的計畫經費有 1000 多、2000 萬的錢進來。我要想辦法去定存，生利息。我當了五年主任，存了 70 萬。其中 50 萬去搞一個微生物系的獎學金基金，餘下的 20 萬傳給下一任主任。

我那時候還是繼續做紅麴的研究，收集了大概一百三十幾種紅麴。當時的紅麴是在臺灣分離的，我們跟公賣局酒類試驗所合作，從釀酒的酒糟中分離出紅麴，再來做鑑定。跟我們合作的有一位叫做林讚峰，他那時候還只是一個小研究員，之後到美國 MIT 去讀博士，回來以後就在酒類試驗所工作，後來當到臺灣菸酒公司的總經理。但過了五、六年後我不做紅麴，部分送給新竹的菌種中心，其他就都銷毀了。



上圖：紅麴菌拮抗革蘭氏陽性菌。黃顯宗老師 提供

我念碩士時，非常努力地做研究，常常是我推著老師在動，做完實驗要請老師看過後再去發表。但比較遺憾的是，沒人告訴我應該要多學一點分子生物學。分子生物

學成為了後來的潮流，回來臺灣以後我覺得自己欠缺了這一塊。所以我就到處去申請，1988 年帶著我太太、還有未滿週歲的女兒，到美國匹茲堡做博士後研究，學習分子生物學。那時候很闊氣啊，學校這邊留職留薪，國科會給我進修的钱，那就夠國外的生活。還有匹茲堡給我的錢，即 Post Dr. 的錢。

進修回來時，是研究生第二屆，那年有五個學生。那時候有計畫的老師大概就五、六個人，每個老師收一個學生。我當主任的時候，老師的人數增加到十一個，系上研究生的名額是二十五名。系上的老師就一起擬出一個辦法，規定每位老師不能收超過兩個學生，若配對完畢後還有剩下學生，才可以再收第三個。學生們填志願，再依照其順序分配各個實驗室。這樣對同學對老師都比較公平，用程序分好，不需要太競爭，每個人都分得到。後來學生少了以後就有問題了。現在一年只有五、六個學生進來，最多七、八個。

現在讀生物醫學的人太多了，所以求職時就要面對很大的競爭。我的研究領域是微生物、食品安全，所以我 2023 年從東吳大學退休後，微生物系想請一個人來接替我的職務。但是大部分來應徵微生物系的人都是以生物醫學為主要研究領域，找了兩年還是沒找到合適的人選，只好讓我回來兼課。我其實不太願意兼這種專業的課，因為這會妨礙後進，但真的找不到合適的人。

也有學生沒有去研究生物醫學。我有個導生名為稽達德，是我們系上第六屆的學生，是軍眷的後代，這些特別的學生我都記得。他大學念完之後，在國防醫學院碩士班做鏈黴菌的研究。鏈黴菌的結構和外觀像黴菌，但其實是產生抗生素最多的一類細菌。他碩士念完以後考上公務員，保送去英國念博士班，研究原生蟲。以前這個很冷門，他拿到博士之後回到臺灣的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成為全臺灣獨一無二管原生蟲的官員。後來一個陽明交通大學的一個原生蟲的教授退休，他從衛福部轉到陽明交通大學去當副教授，<sup>23</sup> 就變成全臺灣獨一無二的原生蟲專家教授。他成為我在講學時的一個範例。讀書時不必趕現在的熱門，一堆人都是一樣的背景，競爭太激烈。

---

23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前身為國立陽明醫學院，1975 年於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 號創立。創立初期設醫學系，後陸續設立牙醫系、醫事校術學系、神經科學系、微生物學系等，2021 年 2 月起與國立交通大學併校，更名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王月鏡主編，《臺北市志卷七：教育志學校篇》，頁 336-337；〈陽明交大首任校長 林奇宏出線〉《聯合報》，2021 年 1 月 11 日，第 A7 版）

## 教學與研究

教師的工作包含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我的實驗室只研究兩個主題：紅麴菌跟腸道致病細菌。在臺灣很少人以腸道致病細菌主題為專業。在教學方面，我會在課程內容中加入這兩者的研究成果，包含實驗數據和照片等。我每年都會更新課綱，也定期更新關於這兩個主題的研究。對我來說，教學與研究是相輔相成的。



上圖：東吳大學微生物系所在大樓「超庸館」。

我在東吳指導過五十個碩士班的學生，在我們學校來說並不算多。有幾個學生互相認識，在同一個單位工作。有個學生在中國化學製藥公司上班，<sup>24</sup> 還有幾個是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的官員。大部分的學生都是大學畢業，接著報考研究所，不過也有幾個學生是先出社會工作一段時間後才來進修。兩者的差別並不大。但先工作再來進修的學生，他們的目的性多半更加強烈，所以學習會比較認真。他們的態度非常積極，不需要我多說什麼，就會自己主動學習、討論課業內容，也常收到學生寫信和我約時間討論期末作業與研究。例如，有位學生在新竹的捐血中心工作，雖然距離很遠，但他從來不缺課，有時候他週末需要加班，就向工作單位換取在上課日請假的方式來上課。

每星期我都有安排實驗室學生完成不同的任務。第一週會先報告研究進度，檢視過去這一週有沒有進步。而第二週多半以是閱讀英文研究論文為主，我會提供學生國外的期刊論文，要求學

24 中國化學製藥公司：於 1952 年 3 月由王民寧創立，初期以製造藥品買賣及有關之進出口業為主，1953 年與日本三共株式會社正式簽約產銷三共合作製品，1959 與美國施實藥廠技術合作，1961 年與美國嘉得大藥廠訂定技術合作，奠定基礎基礎，代理商遍及全臺，並成功將藥品輸出到國際市場。（中華徵信所編，《對臺灣經濟建設最有貢獻的工商人名錄》（臺北市：中華徵信所，1973），頁 85）

生讀完後向大家報告，分享心得。第三週則是運動、爬山，有些人或許會認為應該要專注在學業專題上，但我認為每天一成不變的研究，會讓學生壓力很大。既然前兩週以學術活動為主，第三週的戶外活動是用來活絡、舒緩壓力的。我不太希望用高壓的方式強迫學生，因此會避免要求學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做出實驗數據。以前我在國外唸書時，每週做完實驗後，要將研究過程、結果、數據記錄在複寫紙後面，並將研究成果在研究室 meeting 時口頭報告。回到臺灣後，我更希望和同學間能有更多討論空間，但不是強制性的索要數據。

我幾乎每年都有聘請專任研究助理，他們負責處研究計畫的事務，最多時我的實驗室裡有四個專任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做研究，也幫忙安排我和研究生們的開會時間，所以實驗室裡每天都很熱鬧。我會定期舉辦聚餐，和助理與研究生聯絡感情，當時國科會或是教育部的計畫給教授們比較充裕的資金，我也比較有能力請助理、研究生吃飯，或是在聖誕節等特殊節日舉辦抽獎活動。

我覺得作為一個研究者與大學教授，首要任務應該是做好研究與教學，所以我把大部分的時間與心力投注其中，在輔導方面感覺就做得不夠完善。我剛進入到東吳大學時，和當時的大三學生較為親近，我帶著他們一起做調查、寫問卷，了解他們的喜好。我還沒有小孩前，和太太住在學校裡。每年學生都會來我家一起包水餃，彼此非常熟悉。後來我就比少主動地去接觸同學，但後來，也不太主動和同學們聊天、吃飯、喝咖啡等，師生間的距離就比較遠了。學校後來出現了學業關懷系統，我有約這些被系統關懷的學生來聊天，大約每隔兩年就只會有一個理我，其他的都不會理我，感覺上就會有點落差。

早在 COVID-19 疫情爆發前，我就已經將課程設計成遠距教學的方式，但為了兼顧與同學之間的互動，仍以同步的方式進行。同學們開鏡頭討論發表意見就加三分，以語音方式回應加兩分，在聊天室中以文字方式回應加一分。但實行下來，我發現願意發表意見的同學都不太願意露臉。原先以實體上課時，我將小組討論、作業的佔比調整成總成績的 50%，現在因應線上課程的形式改變，測驗與線上討論反而更為重要。

## 橫跨自然科學與人文領域的課程

1995年，我成為微生物學系的系主任，在這五年間，我一直希望將「自然科學與人文」這門課加入微生物系的必修。我認為微生物系的學生不能只懂得技術。在生物醫學與再生醫學等領域中，像是幹細胞、人工器官、人工生殖，無一不與人息息相關。他們未來可能從事基因轉移，能夠改變細菌狀態、人的胚胎。當掌握足夠的技術後，可以做到很多事，但能不能做、要不要做、該怎麼做、要做到什麼程度，必須了解這些技術與倫理、社會法律的關聯，不能只按照自己的想像隨心所欲，應該要受到倫理的規範。如果只掌握技術，卻缺乏人文素養，就無法成為一個領導人、科學家。科技發展應該要與社會人文互相討論。

微生物系的「自然科學與人文」這門課，其目的在於讓學生們知道科學並非獨一無二，內容包含了科學史與社會學，例如社會達爾文主義，再加上醫學跟人文的關係。我希望讓微生物系的學生認知到，科學技術是牽涉到多重層面，並受到社會的其他學科影響。但遺憾的是，微生物系並沒有持續開設這門必修課，新的系主任與系上的老師認為對於現今學生來說，要求學生修讀跨領域的這些課程，學生恐怕無法負擔。

最後幾年，我在東吳開設了「生命科學與人文」這門課。原在大四下開課，只有十四週。後來系上將這門課調到大四上，就需要上十八週。為了應對多出來的四週時間，我納入了自己的學術經驗，將社會責任與學術結合，透過作業形式，要求學生思考自己的社會責任，並以影片的方式呈現，或是讓同學們在課堂上去分析國內外已經發表的期刊論文被撤回情形的比較差異，來檢視臺灣學術界的風氣與實際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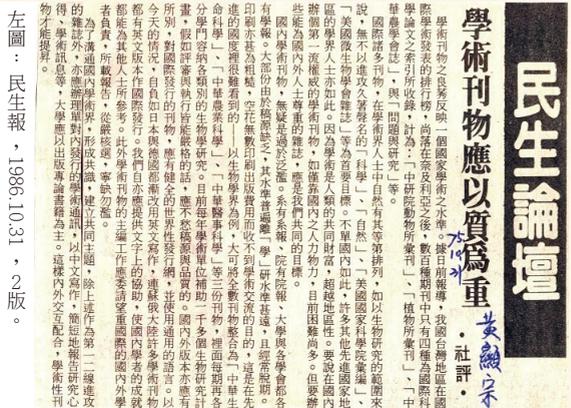
此外，我還主要負責開設兩門通識課，分別是「食品風險與生命科學」與「外雙溪生態的變遷」，前者是教育部為了因應食安危機，下令各大學必須要開設的課程，由於當時系上沒有老師想要開設，因此由我來負責，而後者則是源自於我長期對外雙溪流域的觀察與記錄。

## 社會參與：報紙投稿與消基會

1980年，是消費者運動蓬勃的年代。消費者運動從70年代末臺中、彰化的多氯聯苯事件造成兩千多人中毒開始爆發，消基會也因此成立。那時候是臺灣社會運動爆發的年代，接續消費者運動後，環保運動，出現了很多環保團體。再來是農運，政治的運動。每個階段不一樣。那個年代有很多問題產生，例如說，黃麴玉米事件，從泰國進口了四萬噸發霉的黃麴玉米運到臺灣來，造成很大的風波。那時候媒體報導得很兇。在報紙投稿，主要是因為我愛講話，喜歡發表意見。那時候民生報有個社評專欄，我看到有問題就寫文章，因為怕寫白字，還請我太太幫我訂正，投稿到報社去，每一篇大概1,000多字，2,000元稿費。那時候算是很多錢了。<sup>25</sup>

消費者運動那時期其實還沒解嚴，但我在報紙上投稿，學校也都不會表達關心。而且我寫的是真實事件，站在科學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寫的也很委婉，不會用一些很激烈的言語。我白天處理研究的事，晚上回家寫評論。那個時候還沒有小孩，比較有時間。我過去寫了很多社論，很多雜誌都邀稿，也賺了不少稿費，但我還不算是東吳大學裡寫最多的人，寫最多的是社會系的林嘉誠教授。<sup>26</sup>

文章寫多了以後，《民生報》的總編輯吳心柳問我要不要當報紙的主筆？<sup>27</sup>但當時擔任主筆是要求



左圖：民生報，1986.10.31，2版。

- 25 這些文章後被收錄於胡佛、梁雙蓮編，《信心危機：一九八五台灣政治批判》（高雄縣：敦理出版社，1986）；張曉春、蕭新煌、徐正光編，《社會轉型：一九八五台灣社會批判》（高雄縣：敦理出版社，1986）；高信疆編；柴松林總編輯，《體檢美麗島：一九八五台灣生活批判》（高雄縣：敦理出版社，1986）；柴松林、謝金河編，《財經風雲：一九八五台灣財經批判》（高雄縣：敦理出版社，1986）；李亦園編，《劇變與調適：一九八五台灣文化批判》（高雄：敦理出版社，1986）；柏楊編，《台灣是誰的家：一九八五台灣現實批判》（高雄縣：敦理出版社，1986）。
- 26 林嘉誠：1952年出生於臺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曾任東吳大學社會系教授、臺北市政府研考會主委、政務副市長、行政院研考會主委、考選部部長。（〈高華柱掌退輔會 林嘉誠接考選部〉，《聯合報》2004年5月24日，第A6版；〈廢考被痛批 部長喊冤枉〉，《聯合報》2005年3月3日，第4版）
- 27 張繼高：1926年出生於河北天津，字緒阡，筆名吳心柳。新聞工作者、作家、評論家，曾任民生報總主筆、副社長，臺北之音廣播電臺董事長，中視新聞部經理、中廣新聞部主任，籌組公共電視臺的重要推手，於1995年過世。（臺灣音樂群像資料庫：張繼高，2024年9月1日下載，<https://musicantw.ncfta.gov.tw/people?uid=2&pid=30>）

## 外國霍亂給我們的教訓

80/4/26

·黃顯宗·

秘魯已有近十萬霍亂病例，並蔓延至其他的南美國家。非洲與亞洲的熱帶國家也陸續有零星的霍亂病例發生，本地衛生單位已呼籲民眾注意避免霍亂的降臨。

霍亂是弧型的腸炎菌，原起源於熱帶地區，漸向鄰近地區蔓延。歷史上已有數度蔓延成災的紀錄，甚至有十年一度大暴發的說法。

台灣地區已有很多年沒有發現霍亂病例，在衛生上，這是相當值得珍惜的成績。但環顧我們的環境，未免令人心存警惕；人口密集，農畜水產養殖等業亦密集超載；但是，人畜廢水與其他廢棄物的處理卻問題重重，衛生下水道構築遲緩，用污水橫流來形容，也不能算是太離譜；加以氣候、溫度等都頗為適合，這正是各種腸炎菌存活、滋長、散佈的「天堂」。

雖然如此，大規模的腸炎症確實不太可能在此地發生，起碼，我們有熱食的傳統習慣，自來水都有消毒處理，個人衛生與飲食衛生亦較許多發展中國家好，醫療照顧也好些。但除了呼籲民眾注意飲食衛生外，我們還應擷取以下的教訓：

(一)加強人畜廢水廢物處理：各種細菌在環境裡所在多有，要滅絕是不可能的事，唯有減少其在環境孳長傳播的機會，才能減少禍害。流在表面的污水染問題，人人可見，各方動作頻繁；但對地下的汙染與衛生下水系統的落後，各級政府機關、民代、輿論界也須關心。

(二)加強防疫：有些商人與農畜牧業人士缺乏防疫的觀念，常透過正常或不正常的管道，大量引進各種稀奇古怪的農畜產品。這些行為易破壞本土的生態平衡，而人畜與農作的病菌都可能因此而入，後患無窮。

(三)加強研究與預警：本地有那些腸炎菌？他們的特性、致病性、環境生態等各項問題，老實說，研究得並不透徹。無周詳的研究，便不足以建立有效的預警制度。而研究上也應該從生態至臨床各階段都能相互配合，方能確切掌握各腸炎菌的動態。

(作者為東吳大學微生物系教授)

上圖：民生報，1991.04.26，2版。

每週都要寫一篇，我就不太願意。我寫評論是有感而發的。而且我認為自己是大學教授，不是媒體人，不該被強迫書寫評論。另外，這和我的角色有衝突，教授應該站在一個專業的立場，媒體應該站在另一個角度，不應該混在一起，要有這個分野存在。

後來我覺得應該要專心在研究上，研究案多了後就沒有太多時間寫外稿。再加上小孩出生，非常忙碌，也就慢慢不再投稿。等我開始有閒暇時間，卻發現社會氛圍已經改變了，沒有專家講話的空間。過去曾有專門負責民生問題、衛生問題的記者，後來也都消失了。現在都是一般的社會記者、政治記者。問的、寫的、答的，也都不是專家講的話。

在科學倫理中，我們能夠很清楚的認知到科學人應該要擔負起社會教育的責任，我們向國家申請很多經費去研究課題、發表期刊論文，也應該

將研究的內容普及到大眾社會。雖然是科學普及，但不能違背自己的專業，我看過很多人發表的內容違背科學精神，像是我曾經聽過有人說：「有毒東西就是有毒的，你怎麼會用數據來說明？」，但從科學角度來，物品有毒與否，與劑量息息相關，任何物品，當劑量超過人體可以負荷的極限時，就是有害的。

除了在大學擔任教授外，在校外的話我作為專家，具有發言的權威性。比如說我也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消基會）服務，<sup>28</sup> 是我們系上一個已經退休

28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1979年臺灣陸續發生「假酒事件」、「多氯聯苯中毒」事件，引起社會各界對食安消費意識的關注與消保權益推動的需求。當時臺北青商會長李伸一，在青商會發起並推動消費者保護運動，得到很大的迴響，而結合幾位學者、專家，包括柴松林、黃榮村、蕭新煌、邱清華、章樂綺、白省三人募款於1980年創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由柴松林擔任第一屆董事長，李伸一擔任秘書長。（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關於我們，2024年9月9日下載，<https://www.consumers.org.tw/home.html>）

的曾惠中教授介紹的。<sup>29</sup>我進入消基會時，消基會的董事長是柴松林。一開始先是跟在其他大老後面擔任食品委員會的委員，兩年後擔任召集人，兩年後回任一般委員。消基會每年都要討論，決定要做什麼食品檢驗，怎麼做，怎麼發表才比較能夠具有公正性，公平性。消基會每個月發表時都要面對記者，但我不喜歡這種場合，故沒有出席記者會。

頭兩年做比較特別，讓我印象很深刻。那時候政府還沒有任何的餐廳品質的管制措施和評鑑計劃。我和一些前輩合作弄了一個方案做餐廳評鑑，這完全是一個初創的試辦，也沒有任何模式可以遵循，其實相當於現在食品業、餐飲業的衛生管理方案。我們組織了幾個教授，接受餐廳報名，我們給予指導、審查，也做了評價，通過後頒發獎狀。當時就有西餐廳和便當店來報名，最後有六家通過消基會的審查方案，並得到消基會的表彰。其中有一家是在士林的芳鄰西餐廳，另一家是景美的遠東便當店。特別是遠東便當店，店主只是一位廚師，但他很努力依循我們的要求做了改進，才得到這個表彰，讓我很感動。這個方式類似現在國民學校午餐的招標跟管理上。

後來塑化劑事件爆發後，我就沒有繼續在消基會服務了。<sup>30</sup>對我而言，塑化劑也是個慢性的毒，很輕微，消費者有中毒的情況是很長期累積的結果。但消基會根本沒辦法證明是哪種產品會造成特定消費者健康的損害。那時候消基會幫忙召開很多記者招待會，幫忙打官司，都沒有站在科學的立場來看。我覺得那時候已經不是科學的議題，太過於政治化了。

---

29 曾惠中：陽明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博士，曾任東吳大學微生物學系教授、東吳大學總務長、《科學月刊》總編輯。（東吳大學微生物系：曾惠中小檔案，2024年9月24日下載，<https://www.scu.edu.tw/microbio/thcper.htm>）

30 塑化劑事件：2011年臺灣消費市場上部分食品遭檢出含有塑化劑，進而被發現部分上游原料供應商在常見的合法食品添加物「起雲劑」中，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劑（非食用添加物），引起社會大眾的恐慌。（孫瑞陽，〈塑化劑污染事件之探討〉，《美容科技學刊》（臺中）10：1（2013年3月），頁95-112）

## 關心環境生態，推廣環境教育

念初中的時候，我的國文老師帶著同學們讀《古文觀止》，內容提到張載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段話對我的影響很深，為天地立心，就應該關心自然環境生態啊，讓天地永續運行下去，而環境生態也會影響到民生問題，這就是我開始關心環境生態的其中一個原因。

我印象最深刻的調查，就是在 1988 年兼做的教育研究。那是我第一次有目的去調查，當時的主題是：「各行各業，需要怎麼樣的生物學素養」。我當時選擇了幾個行業，像是化工業、美容美髮業、農業等等，利用系統式的方式調查、統計，這些資料都要親身訪談才能得到。我一直以來都是以微生物學為專業，有位學校長官介紹我參與這個教育研究計畫，那時候我才去了解、學習什麼叫田野調查。

另外一個原因是在我攝影時的發現，攝影是我的興趣之一。原本我相機中的主角是太太和女兒，我照了很多女兒成長的沙龍照。但隨著時間流逝，太太因為年紀漸長而不太願意入鏡，女兒國中後也不太願意再讓我照相了。我從 2006 年就不當主任了，當了三年的理學院院長。院長做不了什麼事。從 2008 年開始，我就去拍攝周圍的環境。一開始希望能拍出漂亮的風景照，你在網路上打外雙溪，找 google image 的照片，很多都是我照的。

後來有一次和社工系羅國英教授聊天，<sup>31</sup> 他說：「老師你怎麼老是照好看的呢？你的鏡頭裡面只有漂亮的東西，那些髒亂、有問題的怎麼都不照一照呢？」這句話啟發了我，我拍再多照片都不會成為一位攝影家，但我作為一位老師，可以利用鏡頭來記錄環境，以及影響環境的問題。這樣以後我就很完整的記錄這個流域，報導每一個點的環境。我一開始並沒有設定要調查特定的區域或生態，而是用較為多元、開放的心態去觀察每個地方，例如，外雙溪往外擴散，其中漂亮的地方，有問題的地方，環境、生態等等。最後才更加關注外雙溪流域的土地濫用情形，例如，濫墾，農舍，財團圈地，政商勾結。過去因為法規不夠完善，人民可以私自圈地，建造花園、山莊，又經

---

31 羅國英：美國德州奧斯汀大學教育心理學博士，曾任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華人本土心理研究基金會：研究群成員，2024 年 9 月 9 日下載，<http://www.indigpsych.org/members/28?scope=researcher>）

歷多次買賣後，產權變得曖昧不明又複雜。因此，我也開設了環境生態變遷這門通識課。另外，我把這些環境調查寫在我的網誌上面。但我不是搞政治的，也不是搞地政，所以就是點到為止，並沒有額外的追蹤或抨擊。也沒有再把東西轉給媒體。也沒有人跟我連絡，去調查後面有什麼樣的勢力。

我認為學生們的生活很沉悶，在課程安排外，應該多點課外活動。我在學生時期只會唸書，社交生活部分大多都是和同學一起踢足球，或是參加比賽，沒有辦活動的經驗，因此我希望讓學生能有相關的體驗。以前劉源俊校長將課外活動稱為「境教」，特別強調「環境」的教育，他很支持我舉辦這些活動。在我當系主任的五年間，每年都會舉辦與環境保育相關的活動，例如：環保週、微生物生態、社區生態與環保等等，每年都有不同主題。校內部分會邀請專家來演講，校外則是會在附近的社區舉辦，讓社區的學生、家長來參與。

這些活動的經費，有的是計畫的錢，也有政府單位的錢。我每年都在向不同機構的申請計畫，可能是環保局、環保署、民間的基金會等。如果成功從外界申請到經費，就不用再向學校申請預算。也因為計畫不同，每年的活動目標也都不甚相同。所以我會把計畫委托給學生去規劃。校內的各科系和社團都有參與過，像是「慈青社」、<sup>32</sup>「璞玉社」、<sup>33</sup>政治系等。<sup>34</sup>



左圖：黃顯宗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戶外導覽。陳有瑾攝

32 東吳大學慈濟大專青年社：1997年成立，是慈濟青年大專聯誼會的第五十個慈青社，平日校內的活動有社區老人居家關懷、骨髓捐贈推廣活動、手語教學、資源回收等；寒、暑假還有在花蓮的各種營隊，包括寒假的尋根、暑假的生活營、志工隊、親子營、海外營等。（東吳大學服務性社團：東吳大學慈濟大專青年社，2024年9月9日下載，<https://www.scu.edu.tw/student/cici/four161.htm>）

33 東吳大學璞玉社：於1995年創立，其前身是隸屬課外活動組的璞玉服務隊。社團的宗旨不僅延續了服務隊下鄉服務的精神，且加入了推廣環境保護觀念的使命，每學期除了出隊服務外，還舉辦迎新、璞玉週等活動，推廣環保知識，以及推動環保性的活動。（東吳大學服務性社團：東吳大學璞玉社，2024年9月9日下載，<https://www.scu.edu.tw/student/cici/four161.htm>）

34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為東吳大學在1954年於外雙溪校區最早復系的學系之一，第一屆主任為張佛泉教授，1991年成立碩士班，1998年成立博士班。（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學系介紹，2024年8月20日下載，<https://scups.ppo.scu.edu.tw/about/1>）

我希望一個人是很靈活的、會思考的、會對前途做規劃。學生們在讀書的時候要學好三個事情，異性交往、辦好社團活動、念好書，缺一不可。我覺得，讓學生們來辦活動是很好的學習方式，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可以按照這個目標來策劃的活動、驗收成果，接著檢討其中不足之處，也會讓他們很有成就感。我常對學生說，這是訓練他們能力的重要機會，學習如何帶領一個團隊去達成目標。後來學生就很有辦法，透過學習，他們會思考如何設計活動流程？行政程序與活動安排為何？他們每天晚上會開會檢討，我也從學生那裡學到很多。那些只會念書的人就不知道這些事。這些活動辦了幾年後，我發現這些活動對於學生來說很有意義，也影響他們很多，甚至有些學生後來報考了環境相關科系的研究所。

另外，社區的反饋也很好。這些活動活動有吃、有喝、有玩，社區中的學生、家長都很高興，東吳也可以跟社區有所互動，讓社區認識我們這個系、這個學校。在這個過程中，我感受到社區民眾的回饋，像他們會給參與的學生頒獎。我們的活動每年會有媒體來採訪、做節目，起碼也會上學校的頭條。曾經有社區家長對我說：「東吳是我們的大學。」，參加活動的學生說：「東吳是最好的大學。」

我之前參與了社工系有關洲美的計畫，但覺得格格不入。他們比較著重在人力的服務上。我之所以參與 USR 的計畫，是因為本來我很在意環境和社區的互動。雖然這個計畫好像比較偏文教，但其實我也很關心這個面向。我也做了福德洋圳的研究，收集了滿多資料。在找尋資料的過程中也學到應用新的工具，例如地理 GIS 的資料運用，到現在士林國小等地早年文教發展的研究。我花了起碼兩年多時間，現在已經寫了三分之二，約有三十幾萬字。現代人都是以現在的價值觀去看以前的事。就像芝山岩事件，<sup>35</sup> 有六位日籍老師被殺，但士林國小校友的回顧卻分成完全對立的兩派。一派是國民政府的講法，一派是日本人的講法。我希望能理解當年的社會民情怎麼看待這件事。

---

35 芝山岩事件：1895 年臺灣總督府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前往劍潭訪勝，過河轉赴士林街調查，途中見到芝山岩，而山上廟宇惠濟宮荒廢無人，欣然決定將學務部設在這裡，並且建立臺灣第一所國語傳習所。1896 年元旦抗日分子結合起來攻擊臺北城，而其勢力之一襲擊芝山岩，剛好傳習所的六位教職員欲前往臺北賀年，行經圓山河畔，遇到抗日份子襲擊而死，史稱芝山岩事件，六位教職員被尊稱六士先生。後來日本人就在芝山岩建立神社、立碑紀念。（吳密察監修、遠流臺灣館編著，《台灣史小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2000），頁 101）



上圖：理學院走廊。